

張其成 從名醫傳人到國學導師

「我一生下來，毫無疑問是要繼承『張一帖』，成為它的第15代傳人。但是，我卻有自己的想法：中醫畢竟只是治病，而治人的關鍵在於治心。」在全國政協委員、北京中醫藥大學國學院院長張其成的辦公室裡，這位內地「國學養生第一人」，向記者講述他的中醫認知與國學情懷。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王曉雪、聶晨靜 北京報道

張其成

張其成出身於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張一帖」世家，父親為內地首屆「國醫大師」李濟仁，母親則是國家級「非遗」傳承人張舜華。與四個弟弟妹妹不同，長子張其成是家裡唯一隨母姓張的孩子。對此，他曾撰文自嘲為「典型的『張冠李戴』」，而易姓的背後，有着一段400餘載傳承的醫家故事。

為承絕學隨母姓

安徽歙縣「張一帖」醫家，被公認為當代影響重大的世醫家族，歷史悠久，遠可溯宋代的張擴、張彥仁、張果三代。自明嘉靖張守仁開始，由於醫術精湛，常一帖(劑)而癒，故人稱「張一帖」，傳至張其成外公張根桂，為第十三代。

「外公膝下無子，但按照祖傳家規，『張一帖』醫術傳男不傳女。」張其成說，萬般無奈之下，外公決定將醫術中斷，「當時12歲的母親就偷着學，被我外公知道了，嚴禁她學，但最後她用力氣和孝心打動了外公。」

張根桂要一心學醫的女兒答應一個條件：終身不嫁。「我媽媽說絕對沒問題。可後來我外婆跟我外公鬧，他就妥協了，退了一步，出嫁可以，但得招上門女婿，生個兒子。」

張其成 本報北京傳真

要姓張。」這意味着，張其成自打生下來，就肩負傳承「張一帖」這一沉重的家族使命。「此命生來怎奈何，前路辛苦後奔波。可憐一對賢夫婦，專為人家養老婆。」張其成說，這是外公曾寫下的一首打油詩。「他很有才，醫術極高，但當年他為家傳一事而整天鬱鬱寡歡，唉聲歎氣。」一代名醫的外公，自己卻未至半百而亡，張其成感慨：「主要是心病。」

立志做「精神的醫生」

幼承庭訓，本該繼承祖業，成為一代名醫。然而，許是冥冥之中有「某種使命」，張其成自小喜好安靜讀書。來家裡看病的人太多，他嫌煩，便一個人躲到二樓去看書。從那時起，淵博精妙的國學便在少年張其成的心理埋下了種子。

中醫治病，張其成卻更想「治心」。兒時的他就隱隱意識到「心病」才是最大的病，並立志要做「治心的醫生」、「精神的醫生」。國學，讓張其成找到了可以治療「心病」的方法，在他看來，國學也是中醫的基礎和源頭，所以「弘揚國學比弘揚醫學更加有意義。」

「我找到了這種使命，然後一直為之奮鬥。」「文革」後，張其成如願考入大學中文系，後又入北大攻讀哲學博士，先後師從訓詁專家錢超塵、易學泰斗朱伯崑，學習儒道禪。隨着學習的深入，張其成越發感到「國學是中國人的心靈家園」。相比於中醫對單個的人身體的治療，國學對群體人心的治療顯得更為緊迫重要。

「易貫儒道禪 道統天地人」

張其成用「一源三流」來形容中華文化的基本結構：一源，為「易」；三流，即儒道禪。「易貫儒道禪，道統天地人。」對於易學，張其成十分推崇，1992年他主編出版內地第一部《易學大辭典》，1997年首次提出「易道主幹」說，認為中華文化的基本精神，一言以蔽之，為「大易之

道」，即「陰陽中和」。

「國學者，人生之學也；國學者，修心之學也。」張其成說，國學目的在於提升人們對人生的幸福度和精神的皈依感。而學習國學的目的在於「修心」——修天地之心、民族之心、組織之心、個人之心。「修心，是重塑中華民族的信仰、找到個人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的過程。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民族精神文化的復興才是關鍵。」

傳承國學 重塑國魂

自2004年起，張其成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內地著名高校擔任國學課程特邀教授，獨立開設國學五經弟子班，目前是內地唯一系統講授國學五經的國學導師。

2011年，張其成發起設立國學基金，並捐資一百萬元。數年來，已在遼、魯等地援建一百所公益數字圖書館，並舉辦六期國學公益夏令營，捐助20期《光明日報》國學博士論壇。他立志要「讓青少年學國學、用國學，敬學易道，傳承國學，弘揚國粹，重塑國魂。」

身為政協委員，張其成在全國兩會呼籲加強高校國學通識教育，建議中小學語文課本多增加系統化的國學經典內容，尤其要加強「八德」教育。多年來，張其成一直以弘揚中華文化、構建心靈家園為使命。「找到了中華文化的源頭、中華民族的心，我覺得很幸福。」



張其成(右二)與父親李濟仁(左一)、母親張舜華(右一)。 本報北京傳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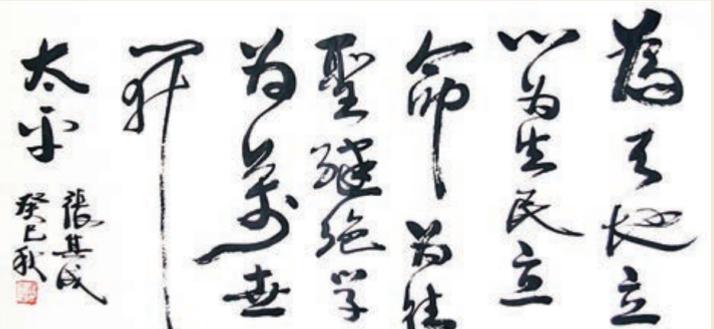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中醫藥大學國學院院長張其成。 記者聶晨靜攝

養生關鍵在於調心

張其成認為，現代社會人們得病，「80%可歸因於心出了問題」。「心」可分三個層面：心態，心智，心靈。「現代人普遍存在信仰危機，價值觀認同偏差。大家都奔錢去，覺得沒錢就不幸福，結果沒錢不幸福，有錢也不幸福。這個心如果不調過來，再怎麼吃營養品都沒用。」

因此他指出：「養生莫大於養心。」在「養心」過程中，需要發揮國學的作用。

張其成身體力行，堅持科學的養生方法讓他看起來比十年前更為容光煥發。他表示，養生需要注意一個總原則：陰陽中和。落實四個方面，具體為：飲食方面，要有節制，根據自己的體質是偏陰還是偏陽，然後選擇不同食物；運動方面，要堅持練功，不要作勞，少做劇烈運動；起居方面，起居有時，不要熬夜；精神方面，情緒要平和，忌大悲大喜。



張其成的書法作品。 本報北京傳真

中醫是中華文化復興先行者



張其成(站立者)參加澳洲中醫文化傳播交流活動，為當地民眾介紹中醫養生文化。 本報北京傳真

雖然醉心國學，但張其成也致力中醫文化與哲學研究。他認為，中醫外下蘊含國學內核。「中醫說一個人有病，謂陰陽失調；怎麼治病呢，調和陰陽；病治好了，就是陰陽中和。」中醫哲學文化，集中體現中華文化陰陽中和、天人合一、仁和精誠的核心價值和思維方式。

屠呦呦憑藉青蒿素的提取而獲諾獎，張其成認為是「中醫藥與現代科學相結合的偉大成果」，並給中醫發展提供了思路：「第一，對中醫藥不要輕易否定，這都是古人智慧的結晶；第二，中醫藥要有全球眼界，與現代科學相融合。」

中醫海外推廣應「道」並進

習近平主席曾指出：「中醫藥學是中國古代科學的瑰寶，也是打開中華文明寶庫的鑰匙。」張其成表示，中醫藥是中華文化偉大復興的先行者，應該走向世界。

在他看來，中西醫最大區別是「西醫是治人的病，中醫是治生病的人。」中醫擴大海外影響，應全方位道術結合，一方面提高療效，另一方面推廣陰陽中和的中醫文化。「論殺死病毒病菌，99%的中草藥效果可以說都比不過西藥。但中醫藥是一種全面的調節，是激發人體自身的抗病潛能，這點西藥能比得過嗎？」



中成書院為目前內地唯一師徒式傳授國學五經的書院，特聘張其成擔任導師。 本報北京傳真

人民政協的「前世今生」

鎮壓反革命的根本依據

宿正伯



作者宿正伯 本報北京傳真



上世紀50年代「公審反革命分子」會場。 資料圖片



當年《人民日報》刊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 資料圖片

鎮壓反革命運動，是與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同時進行的一場大規模全國性運動，對鞏固新生政權起到了重要作用。

從古至今，所有的舊勢力總是不甘心退出歷史舞台的，因而任何一個新生政權都會經歷舊勢力反撲的必然歷史階段。蔣介石退守孤島之前，儘管自知氣數已盡，仍竭盡所能作了東山再起、捲土重來的準備。其中重要舉措之一，就是留下大量特務潛伏大陸，收買土匪與風作亂。

這些特務與土匪，有的直接從事破壞活動，有的則偽裝良善、順應時局、伺機而動。1950年6月25日，朝鮮內戰爆發。緊接着，美國捲入戰爭，並封鎖台灣海峽。他們以為第三次世界大戰即將爆發，國民黨反攻大陸的時刻來臨，紛紛赤膊上陣，發起了對新生政權的猖獗進攻。或炸毀橋樑鐵路，或破壞工廠礦山，或燒毀倉庫資財，或武裝攻襲基層政權，殘害幹部群眾。剛剛開始的國家建設受到了嚴重干擾，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再次受到威脅。能否將這股猖狂氣焰迅速徹底地鎮壓下去，不僅關係到政府的威信聲望，而且關係到國家穩定安全。

早在新政協籌備時期，中國共產黨就已經注意到了反動勢力可能通過潛伏、滲透等方式阻撓和破壞新政

協的成立與新中國的建設。1948年10月至11月間，中共中央同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協商提出的《關於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中即明確提出：新政治協商會議以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反對封建主義和官僚主義壓迫的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無黨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組成。南京反動政府系統下的一切反動黨派和反動分子必須排除，不許參加。

新政協籌備會期間，籌備會常委會收到二十餘件以黨派或團體名義要求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書面請求，如：孫文主義革命同盟、民社黨革新派、中國少年勞動黨、光復會、中國農民黨、中國民治黨、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人民民主自治同盟、民主進步黨、中國人民自由黨等。魚龍混雜，其中有的曾做過一些有益工作，但組織嚴重不純；有的名不見經傳，臨時拼湊，有政治投機之嫌；有的則是反動組織和反動分子改頭換面，意圖在新政協新政府中埋下復辟的種子。籌備會常委會本着堅持進步性的政治原則，經過調查甄別、慎重研究後未予邀請，但對於其中確有一定貢獻的組織和民主人士也作了適當安排和吸納。這說明，中國共產黨從一開始就做好了應對反動勢力破壞的心理準備。

1949年9月，新政治協商會議通過了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臨時憲法性質的《共同綱領》，其中第七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必須鎮壓一切反革命活動，嚴厲懲罰一切勾結帝國主義、背叛祖國、反對人民民主事業的國民黨反革命戰爭罪犯和其他怙惡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對於一般的反動分子、封建地主、官僚資本家，在解除其武裝、消滅其特殊勢力後，仍須依法在必要時期內剝奪他們的政治權利，但同時給以生活出路，並強迫他們在勞動中改造自己，成為新人。假如他們繼續進行反革命活動，必須予以嚴厲的制裁。」這一規定，為鎮壓反革命運動的開展提供了根本依據。

1950年7月，政務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公佈了《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10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糾正鎮壓反革命活動的右傾偏向的指示》，鎮壓反革命運動在全國大張旗鼓地展開。為了從法律上保證運動的有力有序進行，中央人民政府於1951年2月根據《共同綱領》第七條規定，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並頒佈施行。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列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參與了這項條例的協商和制定。

連載(47)